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于沛·主编

彭卫 杨艳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49年前）

于沛·主编 彭卫 杨艳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 第3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49年前 / 于沛主编; 彭卫, 杨艳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6585 - 0

I. ①马… II. ①于…②彭…③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09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郑彤
责任校对 王楠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6
字数 398 千字
定价 1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秦汉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出版学术专著 10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

杨艳秋，1971 年生，四川彭县人。历史学博士。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序

庞卓恒

于沛教授主编和主笔、并约集国内诸多名家协力完成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不仅卷帙浩繁，而且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为什么说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的论述范围涵盖了唯物史观及其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一个发展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初创之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再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而走向低潮，但同时也预示着它必将从挫折中再度崛起，走向一个更加宏阔壮伟的新高潮。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恰在此时面世，这个历史时刻本身就赋予了它一个里程碑的地位。

1976年，在20世纪国际史坛享有盛誉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编写一部对当代世界历史科学概况和趋势加以综合概述的著作。他在一批国际著名史家协助下，历经两年完成初稿，又经集体讨论后定稿。该书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编的《社会与人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丛书之一，于1978年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就是杨豫先生翻译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巴勒克拉夫在该书中对唯物史观和它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创和发展历程做了简略但颇有深度的回顾，值得在此引述。

巴勒克拉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

根本的一个原因是 1848 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 19、20 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①。……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是 1928—1930 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②。1929 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務,正像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③

我之所以在此大段地援引巴勒克拉夫的论述,因为他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是想在这里尽可能实事求是地简略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产生的影响”^④。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他在这里阐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人们接受,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现实生活体验中感受到它言之有理。这就是巴勒克拉夫说“1929 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

① H. S.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8, pp. 226 - 227——巴勒克拉夫原注。

② [法] J. 格伦尼松:《当代法国史学》,载《1949—1965 年的法国历史研究》(*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n France de 1949 a 1965*), 1965 年版,第 21—22 页——巴勒克拉夫原注。

③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32 页。引文中提到的 C. 韦伯斯特的话,见他所撰《历史教学和研究变化的五十年》,载《历史协会, 1906—1956 年》(*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6 — 1956*)——巴勒克拉夫原注。

④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1 页注③。

思主义的时期”这句话包含的真理所在。这也正是实践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的人们的认识规律。

巴勒克拉夫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历史。再次，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又次，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①

巴勒克拉夫把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影响归纳为上述五个方面，实际上这个时期唯物史观指引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上述五个方面。巴勒克拉夫的归纳实际上可说是这个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的即时记录。读了于沛教授主编的6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我们对此会有更多体会。

那么，为什么到20世纪末它逐渐走向了低潮呢？这需要我们去认真做一番总结。我深信，通过这样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然会迎来一个空前宏阔壮伟的新高潮。

2015年2月9日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史学

- 传统史学的转型和新史学的发展 (1)
- 第一节 史学变革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1)
 - 一 传统史学的变革 (1)
 - 二 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3)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8)
 - 一 “史界革命” (8)
 - 二 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10)
 - 三 二十世纪初新史学的共同趋向 (15)
- 第三节 流派纷呈的史学界 (23)
 - 一 西方思潮的涌入 (23)
 - 二 史学流派与趋势 (26)

第二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 (32)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早期译介与唯物史观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 (32)
 -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 (32)
 - 二 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 (36)
- 第二节 李大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者 (43)
 - 一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对唯物
史观史学意义的认识 (44)
 - 二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54)

三	李大钊的史学实践——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66)
第三节	瞿秋白、蔡和森、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71)
一	瞿秋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71)
二	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78)
三	李达《现代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奠基中的作用	(86)
四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92)
第三章	1928—1937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成长	(96)
第一节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早期史学观念	(97)
一	对古代中国社会的解读模式	(98)
二	郭沫若的早期历史观念	(101)
第二节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108)
一	概念的提出	(108)
二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	(110)
第三节	奴隶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	(118)
一	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	(119)
二	几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132)
三	关于“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	(134)
第四节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背景和脉络	(141)
一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复杂背景	(141)
二	论战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	(145)
第四章	1937—1949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	(149)
第一节	历史分期讨论的深化	(149)
一	殷商社会的性质	(151)

二 西周的社会性质	(156)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迁	(164)
第二节 批判与论辩	(168)
一 对秋泽修二侵华史观的批判	(168)
二 对胡适实验主义历史观的批评	(171)
三 关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	(176)
四 批判“战国策”派	(179)
五 批判复古倾向	(183)
第三节 中国通史的编纂	(191)
一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及其历史观	(194)
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及其历史观	(197)
三 翦伯赞《中国史纲》及其历史观	(208)
第四节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 史学观念	(218)
一 侯外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	(218)
二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侯外庐的史学思想	(226)
第五节 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	(231)
一 历史研究的理论	(233)
二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236)
三 历史学的价值	(238)
四 历史规律	(240)
五 历史的关联性	(244)
六 阶级和阶级分析	(252)
七 传统史学	(254)
八 史料	(258)
九 历史知识的普及	(263)
第六节 毛泽东的历史观	(265)
一 毛泽东早年对历史的认识	(265)
二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初步形成	(268)

三 两个核心与六个原则：毛泽东历史观的发展
和走向成熟 (272)

四 毛泽东的中国历史研究 (291)

结语 理论的壮阔与研究的意境 (305)

附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大事记(1898—1949)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57)

索引 (388)

后记 (401)

第一章

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史学

——传统史学的转型和新史学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中，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应当沿着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道路进行追寻。

第一节 史学变革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一 传统史学的变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逐渐走向解体，就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双重煎迫引起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忧虑和深思，要求当世学风的变革。脱离现实、日趋烦琐的考据学日益受到批判，由庄存与复活的《春秋》公羊学在嘉道年间崛起并逐渐走向兴盛，治史成为一时风气，形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学繁荣。

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剧变，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在“开眼看世界”和“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影响下，晚清史学开拓出了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领域。无论是研究的范围、内容乃至重心,都出现了新的趋势,突破了传统学术格局,踏上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史学研究视野由内向外,出现了梁廷枏《海国四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王韬《法国志略》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述。他们的共同特点表现在撰著意识上,联系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抉择和命运的估量,或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①。

其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盛。姚莹《康輶纪行》、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等著作“以考古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②,由叙沿革转向重实用,涉及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这两股史学思潮的奔腾、激荡,都同时代的脉搏发生着共振。”^③

此外,还出现了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等与现实密切相连的当代史著和鸦片战争史著,史学研究的重心从古代转向当代。

鸦片战争以来的晚清史学,表现出史学与时代和现实的密切结合,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学被称为“经世史学”。但这种经世,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彰善癉恶”“彰往查来”“资以借鉴”的史学经世,其中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史学救国”的思潮,反映出19世纪后期史学领域内发生的鲜明变化。这种变化表明,以往限于传统社会,以帝王将相为考察对象的

①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页。黄遵楷(1858—1917),字牖达(亦作幼达),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黄遵宪幼弟。清光绪举人,曾任清末驻日外交官。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有《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传世。

③ 瞿林东:《开眼看世界——中国近代史学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旧的史学格局被打破了，史学的研究中心由古代转为现今，史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由国内拓展至国外，中国史学开始面向世界，这是近代中国史学出现的最早变革，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晚清史学的变革是在外力压迫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史学进行自身调整的结果。但这些变革，主要由治史指导思想的根本变化带来，“对于历史学本身，还没有提出除旧立新的改造方案”^①。或者说这些变革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所作的内部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史学的模式。^② 更大的变革的到来，是此后“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西方史学理论的最初传播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天朝大国”的门户，同时，也揭开了近代东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史学理论系统地传入中国，大约开始于19世纪末。其最初并不是通过史学本身，而是夹杂在与史学理论有一定关系的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译著中带入。鸦片战争后，西方社会学，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社会学是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社会科学，创始人为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经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阐扬，逐渐发展为一门包括人类学、人种学以及历史发展总理论的包罗万象的学科。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这种以探索社会演变规律为宗旨的理论和方法很快就被引入了史学领域，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成为19世纪后期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19世纪末，这一

^① 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2页。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山东省金乡县人。当代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贡献卓著。

^② 刘俐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新兴的学科被介绍到中国。1882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斯宾塞(其序言中称为文本守)所著《肄业要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了解斯宾塞思想的重要开端。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精深微妙,繁富奥衍”,称其“宗天演之力而大阐人伦之事,帙其学曰群学”。还极力推扬说:“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①

达尔文的进化论最初通过传教士的译作引入中国。1873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中国学者华蘅芳合译的《地学浅释》就提到了“物种可变”说,此后傅兰雅《格致汇编》、丁韪良《西学考略》中也有一定的介绍,但当时这种理论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的姿态出现,还未引起普遍的重视。进化论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始于严复。他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也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内容。严复介绍说:“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他还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到人类社会中,指出:“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②1896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普及读物。译文先是在《国闻报》上分期刊出,1898年,又以《天演论》为名,正式出版。在翻译过程中,严复并未采取忠实于原著的态度进行直译,而是有意识地将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法则”糅合在一起,“取便发挥”,对原作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大力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中对循环论和天道不变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判,反复强调宇宙和社会处于进化发展之中,“世道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严复(1854—1921),原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再改名复,字幾道,晚号癸廌老人,别号尊疑,又署天演哲学家。福建侯官人。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译作汇刊为《严译名著丛刊》,具有启蒙意义。

② 同上书,第16页。

必进，后胜于今”^①。《天演论》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② 进化论的传播，使国人对历史有了崭新的认识，顾颉刚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③

此外，孔德以来社会学倡导的实证方法、比较历史方法以及广泛吸取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法学、民俗学、统计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主张，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思想的正式冲击，始于19世纪末斯宾塞《肄业要览》一书的流传。其中对旧史学进行的系统批评，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④ 20世纪初年，中国迎来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第一次高潮，一些新型报刊如《湖北学生界》《留学译编》《汉声》《学报》等都有栏目专门介绍近代西方史学思想。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1859—1936）《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1839—1931）等人有关论著编译的《史学概论》，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1859—1945）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史

① 严复：《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页。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94页。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方面成就卓著，被誉为国学大师。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开创者之一。一生著述颇丰。

④ 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35—153页。

学理论著作,在1903年便有六种版本。1903年,英国学者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也被译介到中国,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即主要来自这部著作。这部著作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

20世纪初,各国文明史学,特别是日本文明史学的传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明治初年,在欧洲启蒙思想和文明史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编写文明史的热潮。它以“鼓动世道之改进,知识之开化”为宗旨,在史学界高树“文明开化”的旗帜,批判封建史学,主张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取代帝王为中心的、偏重政治权力记载的旧史学。^①1897年,康有为在他的《日本书目志》中提到了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福田久松《日本文明略史》、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等文明史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东籍月旦》,介绍日本的学术书籍。其中提到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文明史》,家永丰吉与元良勇次郎合著的《万国史纲》,永丰秀树所译的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日本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多部日本人著译的“文明史”,并倍加推崇。他盛赞《万国史纲》“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来,故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②。称基佐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批评中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因而“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认为“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③。

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译介日本文明史著。自1901年到1903

^① 参见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②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96—97页。